

广西铜鼓设计解构及文创运用研究

彭融, 雷璐, 褚兴彪
(广西大学, 南宁 530004)

摘要: **目的** 以广西在地铜鼓为研究样本, 通过铜鼓三维空间造型与装饰图案的提取, 探析模块化应用策略下铜鼓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衔接的方法, 实现铜鼓文化设计传承与创新。**方法** 综合博物馆考察、网络搜索和文献阅读等方法, 收集广西在地铜鼓典型样本, 归纳铜鼓三维空间造型与装饰图案基本规律及视觉效应, 提取有效造型线条及典型的纹样装饰, 并运用分解、重构、平滑处理等方式对图形元素进行优化, 搭建模块化的图形元素资源库。最后, 在“三月三”节日花灯设计案例中予以体现。**结论** 通过“归纳—提取—分解—重构”的现代设计手法, 将广西铜鼓三维空间造型与装饰图案运用在现代设计中, 既有利于引导产品文化价值提升, 又能够推动广西铜鼓文化的传播, 并在日常应用中予以传承。

关键词: 广西铜鼓; 解构; 文创设计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2)06-0297-10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6.039

Research on Design D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Elements of Bronze Drums in Guangxi

PENG Rong, LEI Lu, CHU Xing-biao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elved into the strategy of extraction, design and modularized application of 3D design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bronze drums in Guangxi,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culture of bronze drums into style of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First, typical samples of bronze drums in Guangxi were collected from museums, the internet and literature. Second,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fundamental rules and visual effect of the 3D design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amples so as to extract effective lines and typical patterns. Third, a modularized pattern database was built by redesigning the graphic elements with the design technique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astly, the patterns were presented as a lantern design case for the Zhuang Song Festival in Guangxi on March 3 o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Through the modern design technique of "summary-extraction-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the 3D design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bronze drums were applied in contemporary design, a method that not only adds more cultural value to products, but also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of bronze drum culture of Guangxi in daily application.

KEY WORDS: bronze drums in Guangxi; deconstruc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铜鼓是流行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 始于春秋时期, 盛于两宋, 并流传至今。广西是铜鼓藏量最大、类型最全的地区, 所藏铜鼓几乎贯穿了铜鼓发展的整个阶段, 其中, 灵山型、北流型、

冷水冲型铜鼓是在广西出土, 并以广西村镇命名, 说明广西铜鼓文化的代表性^[1]。铜鼓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是壮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风貌的映射, 是民族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

收稿日期: 2021-12-23

基金项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 (JGY2018017)

作者简介: 彭融 (1994—), 女, 硕士生, 主攻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 褚兴彪 (1973—), 男,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景观设计、设计文化研究。

组成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很有借鉴意义^[2]。当今,铜鼓文化的运用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被广泛运用在广西歌舞、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品等领域,表现了铜鼓艺术的张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如广西民族博物馆建筑、南宁机场高速上的铜鼓雕塑等;另一方面,铜鼓文化在价值较高的产品、公共设施上应用居多,而在平价小物件、日用小商品上运用不足,因而存在与普罗大众生活相对脱离的问题。拓展铜鼓文化应用空间,顺应传统文化复兴的发展趋势,铜鼓文化与现代设计产品的衔接应向时尚、精致、实用转变,融入在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广西“三月三”传统节日有悬挂花灯和民俗巡游的习俗。将铜鼓文化切入花灯,制作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平价产品,对铜鼓文化发扬和传承有推动作用。但简单地移植传统文化元素会导致工艺品成果缺乏创新点,或偏离现代审美,背离市场需求。因此,文中运用“归纳—提取—分解—重构”的现代设计手法,将铜鼓文化精华提炼出来,并进行模块化、高质量的再应用。

1 铜鼓造物艺术解析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器的认识,以老子的阐释最具有代表性。“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朴散则为器。”在老子看来,糅合陶土以制陶器,器体中有了虚空的空间,产生了盛物的实用功能,即谓之“器”。老子对“器”的阐释,不但指出了“器”是什么,而且涉及了制器的工艺和制器的目的^[3]。概言之,器总是以一定的“形”而存在,并由某种材料通过某种方法制成,为人们所用,满足人们所需。当人们造物仅是为了满足实用需求时,器之“形”包含实用因素即能满足;

当人们造物除了满足实用需求,还需衍生出精神需求时,器之“形”既包含实用因素,也衍生出审美因素。

铜鼓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实用器到神器、重器、乐器的多种社会功能,发端于云南并沿着大江大河传播到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省(区)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铜鼓受多区域多文化的影响,衍生出了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灵山型、北流型、遵义型、西盟型、麻江型等8种基本形制,反映出铜鼓通过自身的变迁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实用需求和精神需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铜鼓造物艺术形式,包含铜鼓的三维空间造型及多样性装饰图案。

1.1 铜鼓三维空间造型要素提取

构成学中的三维空间造型,强调造型美与材质美的有机统一^[4]。铜鼓材质具有稳定性,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通体铜铸的特征,铜鼓造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变化性。

铜鼓造型的相对稳定性是其发端同一性的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铜鼓源于铜釜^[5]。古时,人们在饭余,将用于盛放事物的铜釜倒置敲击以伴乐舞,久之,演化出早期铜鼓。由此,铜鼓器型与铜釜十分相似,具有“中空”“腰曲”的特点,并在发展中传承了下来。

陶釜在演变为铜釜的过程中,其腰线位置逐步提高;形成铜鼓时,又逐渐细化出了鼓胸、鼓腰和鼓足等结构;后在不同的器型演变中,腰线和鼓足都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变化,例如,当鼓足较低时,腰线弧度较为缓和;当鼓足升高时,腰线弯曲程度加大。但无论鼓身如何变迁,八个器型的铜鼓都保留了原始釜身的曲线形式,体现出铜鼓形态相对稳定的特征。铜鼓器型演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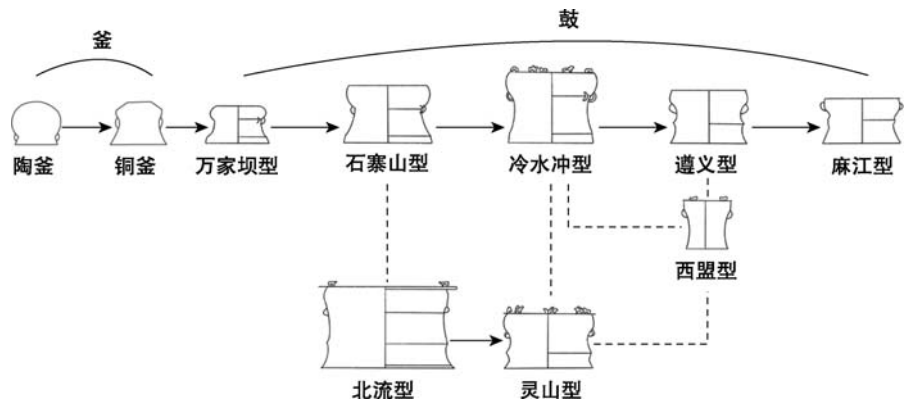


图1 铜鼓器型演变
Fig.1 The evolution of the type of copper drums

在铜鼓“中空”“腰曲”的基本特征下,社会功能转变带来的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变化是促使铜鼓造型不断改变的内驱动力^[6],构成了铜鼓造型的变化性。早期铜鼓保留铜釜特征,鼓面较窄,鼓胸较圆,鼓腰

曲线明显,鼓足略大于鼓面;发展期铜鼓适应了其作为打击乐器的实用需求,鼓面变宽并与鼓足基本平齐,鼓腰曲线明显;鼎盛期铜鼓承担神器、重器的社会功能,在庄严、稳重的审美趋势要求下,鼓腰线型趋直,

铜鼓鼓面平齐或略大于鼓足；衰落期的铜鼓主要作为民间乐器，承担“娱人”功能，鼓面与鼓足基本平齐，腰线在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当代，将铜鼓与文创新载体相衔接，势必会改变铜鼓的实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在其向新载体融合的过程中，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应以适当改变的方式来回应。

铜鼓的侧面线型是铜鼓器型演变最为明显的部分，直观地反映了不同器型的铜鼓形态特征。同时，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可由铜鼓侧面线型旋转得出，因此，将其作为铜鼓三维空间造型要素提取的元素是有效的，见图 2。

以八个铜鼓器型标准器为样本，通过计算机描摹的形式，提取出其侧面曲线线型 27 条，再细化分解成鼓胸（A）、鼓身（B）、鼓足（C）3 个部分进行平滑处理，优化后的铜鼓曲线在保留原始器型的曲线走势特征基础上，迎合了当代简单、流畅的审美趋势，

形成铜鼓三维空间造型线形库。在具体实践中，依据实际设计需求，从库中挑选适合的鼓胸、鼓身、鼓足线条，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探索符合现代审美的构成形式，对铜鼓器型进行创新再利用，形成“归纳—提取—分解—重构”4 步走的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应用策略，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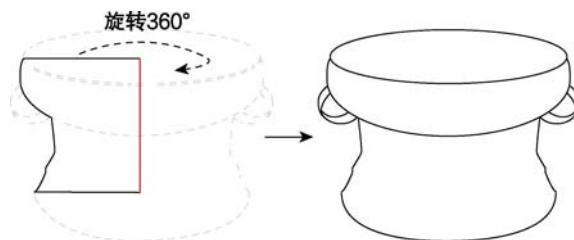


图 2 铜鼓立体构成

Fig.2 The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copper drum schemat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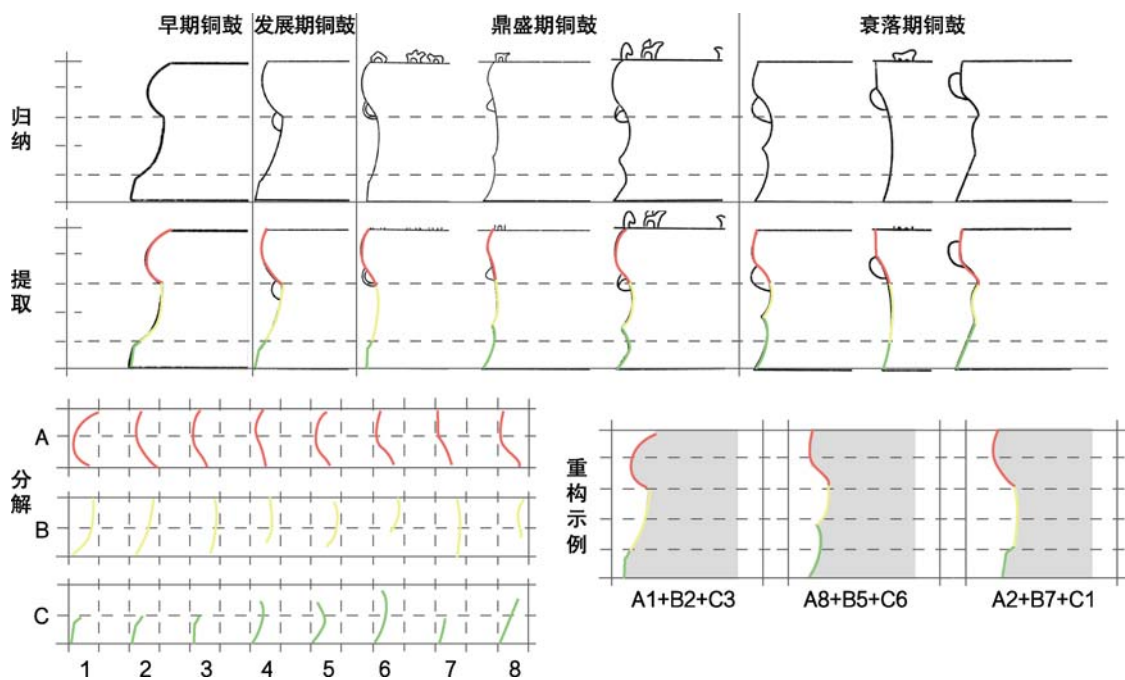


图 3 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应用策略

Fig.3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hape of the copper drums

1.2 铜鼓装饰图案提取

装饰图案或称图案、纹样，是具有特定的适合范围和实用性的一种设计形式和体例。早先的装饰图案是在器物 and 实用品上附加的图形或纹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是与工艺制作相结合、与材料相统一的一种艺术形式^[7]。铜鼓通体饰纹，装饰图案是铜鼓艺术的重要内容，涵盖自然、生活、原始信仰、习俗等题材，刻画形式有阴线、阳线、立饰等，体现意、图、吉、美的民俗审美取向，在布局上具有规律性，在内容表达上具有多样性。

除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素面无纹之外，铜鼓装饰图案的布局体现为鼓面以太阳纹为中心的同心圆状

对称式布局，鼓身呈鼓胸、鼓身、鼓足多层式布局，具有较为稳定的规律性，见图 4。

铜鼓装饰图案种类繁多，形态多样，民俗内涵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太阳纹就有数十种不同的形态。为了从多样化的图案中选取最合适的图形设计元素，笔者考察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博物馆等，并查阅馆藏铜鼓图录^[8]，在广西铜鼓八个器型中，每个器型选取 2 个在地铜鼓作为研究样本，见图 5。

分析对比所选铜鼓的图案特征和辨识属性，在保留其民俗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图像叠加、描摹的方式提取出简化图形，建立铜鼓装饰图案数据池。数据的筛选分为鼓面、鼓身 2 个部分，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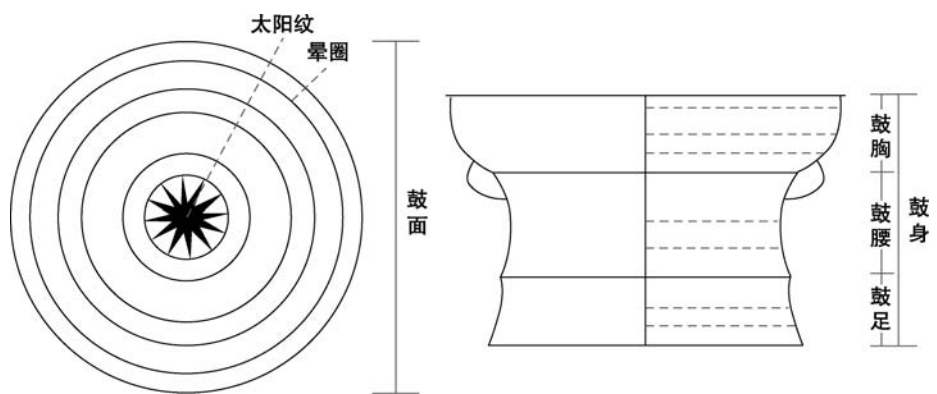


图 4 铜鼓装饰图案布局
Fig.4 The layout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 of the copper drums

图片								
编号	000021	000025	19488	06998	004824	004826	004825	004861
图片								
编号	005039	04830	005595	004874	004757	005045	0015	0019

图 5 选取的广西在地铜鼓样本
Fig.5 Selected samples of copper drums in Guangxi



图 6 铜鼓装饰图案归纳、提取步骤
Fig.6 The generalization and extraction step diagram of the copper drums decoration pattern

通过对 16 面广西在地铜鼓鼓面、鼓身的纹饰整理（见图 5—6），归纳得知，鼓面纹饰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太阳纹、雷纹及其复合纹、同心圆纹及其复合纹、立饰、栉纹、变形羽人纹、鸟纹、钱纹、云纹、花纹等（见图 7），鼓面装饰体现出以几何图形和线形构成的抽象性图形为主的图案特征，以太阳纹为核心的辨识属性；鼓身纹饰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同心圆纹及其复合纹、雷纹及其复合纹、栉纹、钱纹、复线三角纹及其复合纹、水波纹、船纹/划船纹、变形羽人纹、

圆心三角垂叶纹、席纹、花纹、鸟纹等（见图 8），在鼓面纹饰延伸的基础上，图案特征体现出更多具象的民俗意图，例如石寨山型铜鼓上的划船纹、舞蹈纹、牛纹等；将鼓面、鼓身综合来看，太阳纹、雷纹及其复合纹、同心圆纹及其复合纹、栉纹、钱纹、变形羽人纹等是铜鼓较为常见的纹饰，见图 9。在设计过程中，可根据鼓面、鼓身及综合出现频率有针对性地对纹饰进行选取。除高频率出现的纹饰外，铜鼓还有代表性的纹饰如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羽人划船纹、累

蹲蛙立饰等，它们反映了古百越民族鸟、蛙崇拜的习俗。挑选高频率出现或富有代表性的图案，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其从样本中提取、优化，得出铜鼓典型装饰图案，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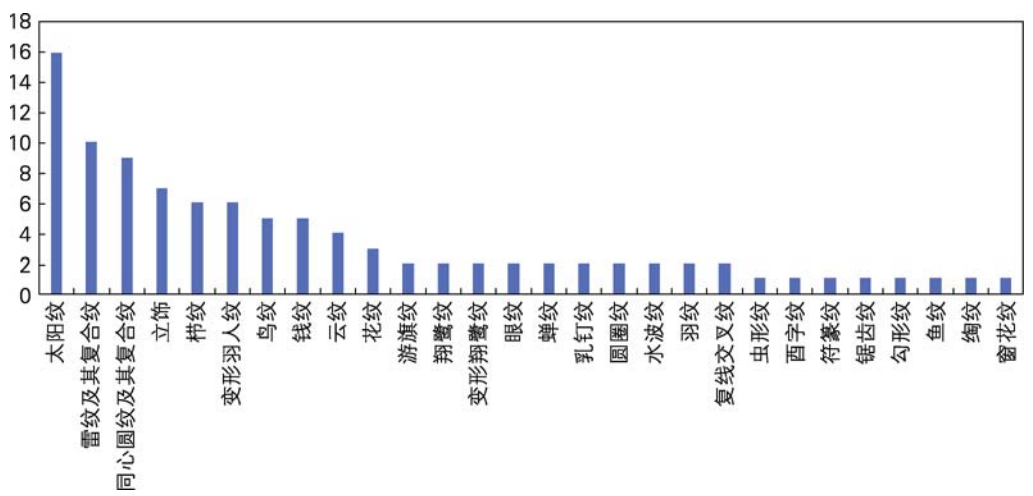


图 7 鼓面装饰图案出现频率
Fig.7 Frequency of decorative pat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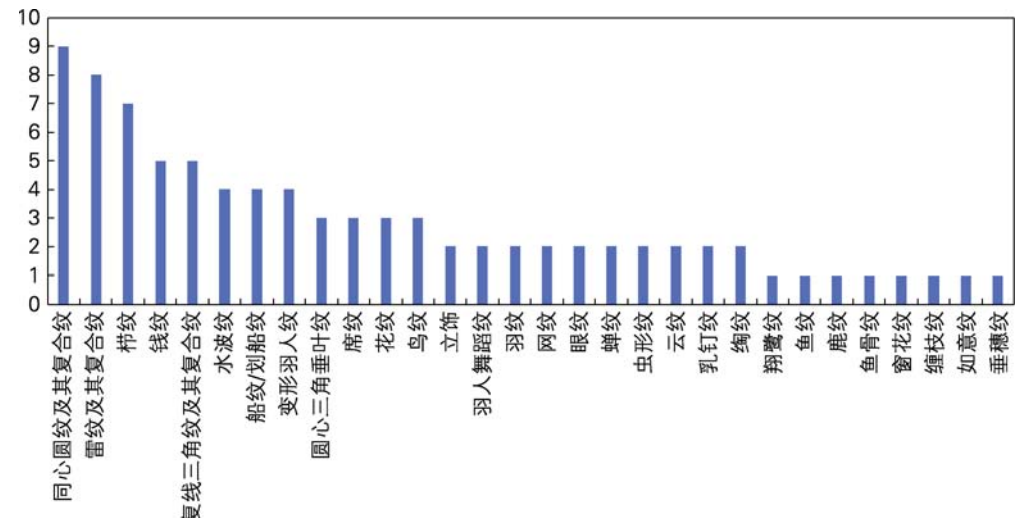


图 8 鼓身装饰图案出现频率
Fig.8 Frequency of decorative pat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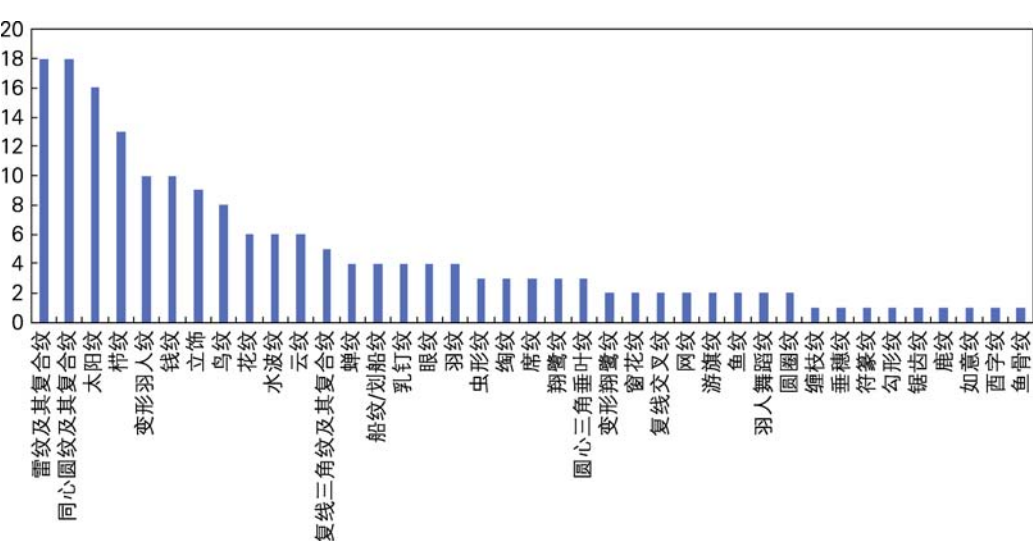


图 9 综合装饰图案出现频率
Fig.9 Frequency of decorative patterns

表 1 典型装饰图案优化范例
Tab.1 Examples of typical decorative pattern optimization

装饰图案		样本								提取
高频率	太阳纹									
	雷纹及其复合纹									
	同心圆纹及其复合纹									
	栉纹									
	钱纹									
	变形羽人纹									
代表性	翔鹭纹									
	羽人舞蹈纹									
	羽人划船纹									

表 1 中提取出的铜鼓典型装饰图案综合了铜鼓高频率、代表性的纹饰,是铜鼓繁多纹饰的共性代表,体现铜鼓纹饰意、图、吉、美的民俗意蕴,此表亦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其类目,例如花纹、水波纹等。在图案提取过程中,除了基础的对比和描摹手段,还添加了田字格分区分析法作为辅助手段。田字格分区分析法将图像分为 4 个区域,通过分别分析每个区域的图像构成特征来提取图案构成规律。以变形羽人纹为

例,选取 4 个样本分别作田字格分割,可直观地得出羽人纹构成规律,即:左上格以同心圆为主,表达羽人头部;右上格、右下格平分变形羽人纹饰的横线部分;左下格通常作留白处理,见图 10。田字格分区分析法有效地辅助了纹饰特征的处理,尽可能保留了同种纹饰共有的基本特征。将提炼出的装饰图案作为基础设计素材,达到辅助产品精确阐释铜鼓文化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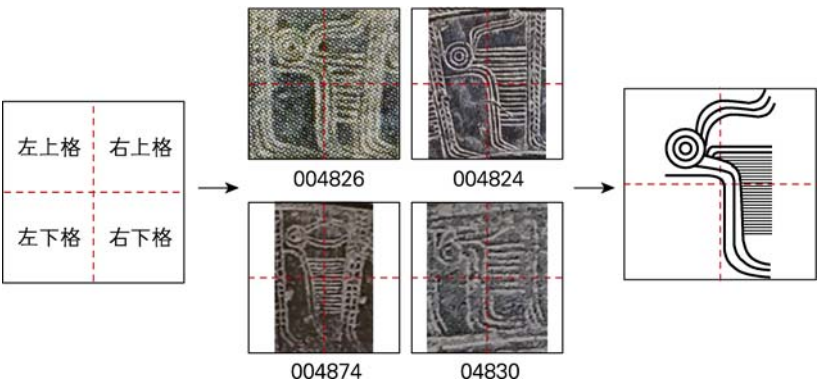


图 10 田字格分区分析法
Fig.10 The field-type partition analysis method

铜鼓三维空间造型的线条提取与铜鼓典型装饰图案提取,共同构成了铜鼓装饰模块化应用的素材基础,将其依据一定的形式组合并加入具体的设计应用中,使铜鼓文创繁荣发展。

2 广西铜鼓与“三月三”传统节日灯笼的切合策略

将传统事项用新的载体来传播、吸引新的受众,

能让其得到年轻人的欢迎,是非遗保护突破困境的方法之一^[9]。同时,传统事项和新载体相结合的逻辑性和合理性,需建立在对二者形态及隐喻的多义性进行详细的剖析和研究的基础上^[10],这要求传统文化在选择传承和发展的新载体的过程中,应注意将新载体定义在传统文化内涵和构成形式的切合点处,以此促进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广西铜鼓文化与广西“三月三”传统节日灯笼设计相结合,便是基于二者之间文化内涵和形式的切合。

2.1 广西铜鼓与“三月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切合

壮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载体和复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体的艺术事象因传统节日的举办而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11]。同时,体现民族元素,发扬民俗特色也是民族传统节日延续的根本。由此,选取广西“三月三”传统节日作为广西铜鼓文创衍生的平台,能够引导广西铜鼓文化与“三月三”传统节日文化相互增益^[12],构成广西铜鼓与“三月三”传统节日结合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文化内涵的切合则构成二者结合的元素。

广西“三月三”传统节日与广西铜鼓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也承载着壮族民俗文

化,在广西区域流传已久,二者在历史上就有着文化的切合。首先,自古以来,铜鼓就是“三月三”歌圩习俗的重要乐器之一。铜鼓作为传统打击乐器,奏以乐舞,有着“娱人”的功能,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素有在节日庆典中击打铜鼓以庆佳节的风俗,这一风俗沿袭至今。其次,铜鼓文化中包含着意、图、吉、美的趋吉特质与“三月三”佳节喜庆的节日氛围相契合。因此,将铜鼓元素运用在“三月三”传统节日之中,不仅是已经普遍存在的习俗,也是相辅相成的搭配,既有利于增添“三月三”传统节日氛围,又能促进以铜鼓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文化发展,见图11(图片来源为广西新闻网)。



图11 广西“三月三”传统节日中的铜鼓元素

Fig.11 Copper drum elements 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March 3" in Guangxi

2.2 广西铜鼓与花灯构成形式的切合

在设计中,同构、重构都是重要的设计手法,能让2个不同的事物结合、交融。广西铜鼓与花灯构成形式的切合及花灯文创载体的灵活性、接纳性是促使广西铜鼓与花灯较好结合的因素。

同构的本质是“相互的映射”,是由物态相似因素之间形成的一种状态^[13],同构的应用要求设计元素与新载体在构成形式上有一定的切合点;重构则是指将物体原始结构进行解构,再将基本的零件重新组合,以形成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前的一个对象的结构。在传统文化植入新载体的过程中,重构后的最终物态应能够承担新载体所需具备的功能。

花灯,又名灯笼,通常由纸或者绢作外皮,骨架则使用竹或木条,中间放上蜡烛或者灯泡制作而成^[14]。广西铜鼓与花灯在构成形式上都具有“中空”“饰纹”“腰曲”的特点,因此,两者在造型上具有一定的契合度,通过同构的形式将两者结合较为恰当;同时,花灯起源中国汉代,流传千余年,衍生出了壁灯、宫灯、景观灯、手执灯、河灯等形式多样的花灯,外观多元,因此在造型上具有灵活性、接纳性。这意味着广西铜鼓元素通过“重构”的方式,重新组合成不同形式的花灯形态拥有更多可能性,可衍生出多样化的花灯产品,这体现了广西铜鼓花灯文创的延展性。

3 花灯设计思路

花灯设计方案是铜鼓三维空间造型与装饰图案的模块化应用的具体实践,为使设计应用具有一定代表性,方案选取儿童手提花灯、悬挂宫灯和水上河灯3种类型,花灯功能分别侧重于“使用”“观赏”“习俗”。

儿童手提花灯遵循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和装饰图案的模块化应用,由左至右共设计有4个款式,见图12。首先,灯身由线形库中的多样线形组合、旋转构成,保留铜鼓鼓身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体现铜鼓三维空间造型策略的应用;其次,灯身分别用“雷纹”“栉纹”“同心圆纹”“钱纹”等铜鼓典型纹样装饰,体现高频率装饰图案应用策略;最后,将龟、牛、累蹲蛙、蛙等铜鼓代表性立饰放大,并以单体装饰的形式作为手提花灯造型特色,提高不同样式间的区分度,彰显花灯的铜鼓元素特色,体现铜鼓代表性元素的应用。

悬挂宫灯的灯身以较修长的遵义型铜鼓器为基础,应用三维空间造型方法提取出其线条并与传统宫灯文物进行比对。比对发现,铜鼓鼓身曲线虽走势优美,但线型过于柔和,与宫灯以直线为主的制式相差较大,缺乏规范、典雅的美感,且不利于宫灯骨架的批量制作。因此,在保留铜鼓鼓身曲线走势的基础上,方案将鼓身曲线进行折线化处理,以形成刚柔并济的

灯身线性。此外，在装饰图案方面，宫灯集太阳纹、雷纹、同心圆纹、栉纹、钱纹、翔鹭纹、变形羽人纹、羽人舞蹈纹等多种器型铜鼓经典纹饰图形于一身，并遵循鼓面同心圆式、鼓身下分层式排列规律，较好地融合了铜鼓文化和传统宫灯样式，实现了审美性和实用性的统一，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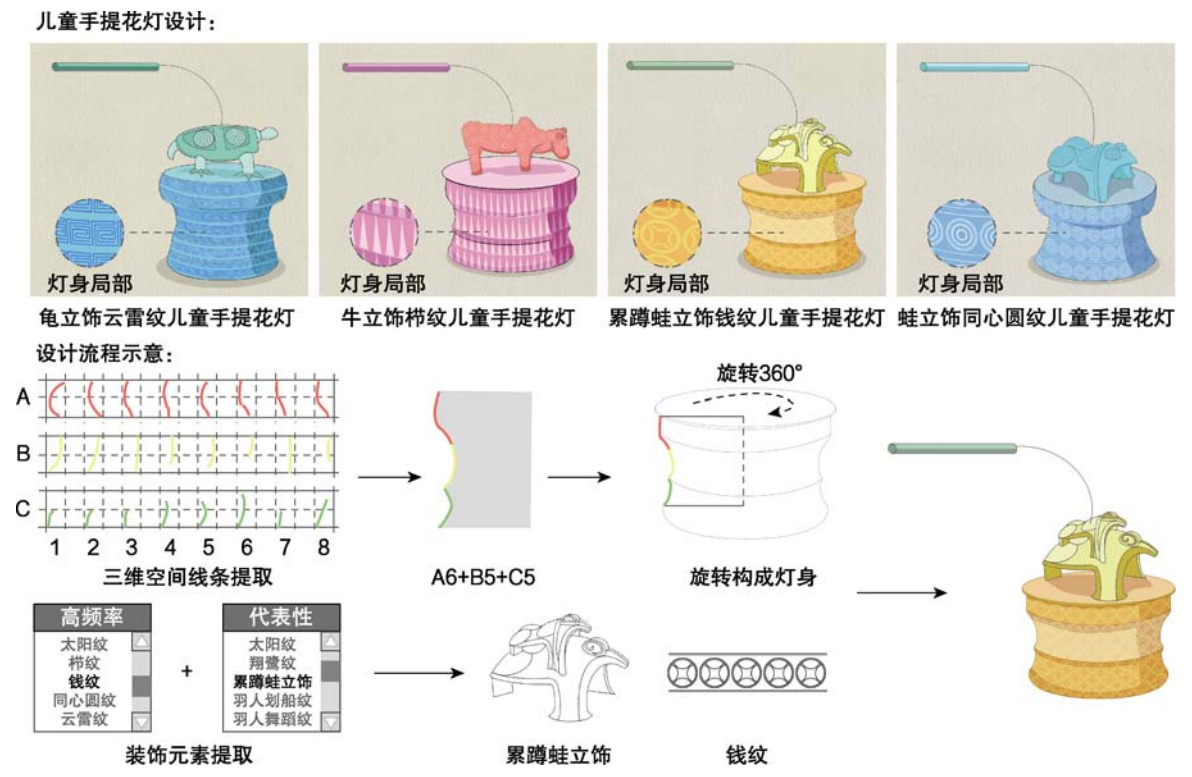


图 12 儿童手提花灯
Fig.12 Children's hand-held lan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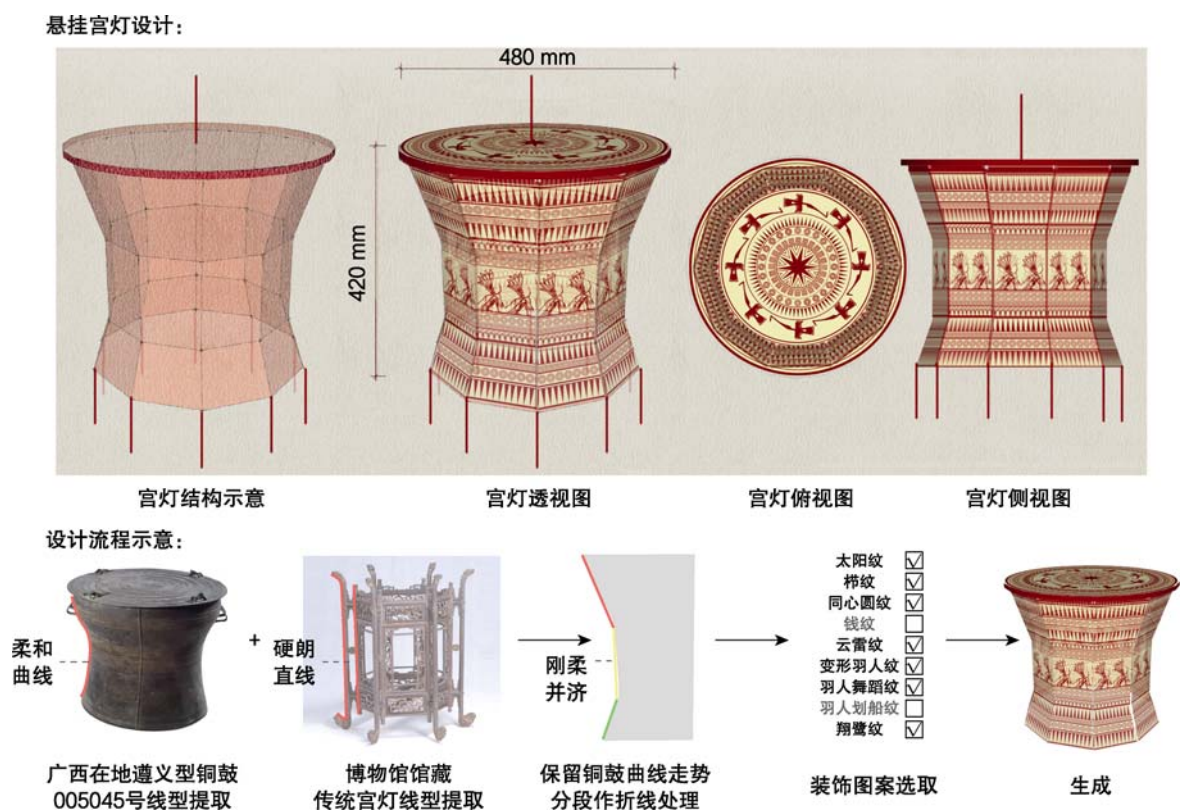


图 13 悬挂宫灯
Fig.13 Hanging palace lanterns

水上河灯选取铜鼓较具代表性的羽人划船纹作为创作元素,将纹饰进行立体化处理而成,借中心的

蜡烛为光源,在夜色中,凸显原始娱神活动浪漫、神秘的特征,带领观赏者梦回原始时代,见图14。

水上河灯设计:



设计流程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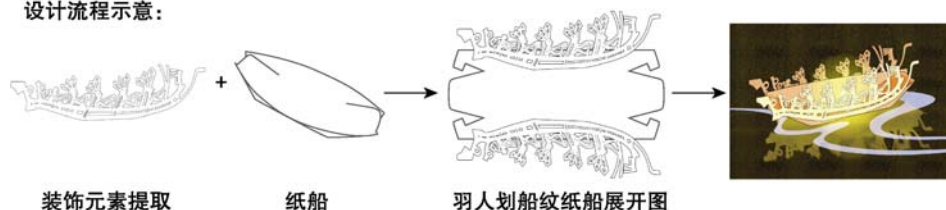


图14 水上河灯
Fig.14 River lanterns

方案设计通过对铜鼓三维空间造型及纹饰图形的分解重构,适当运用夸张、放大、立体化设计等手法凸显铜鼓构成特色,实现了铜鼓纹饰的模块化应用,将铜鼓文化图形“意、图、吉、美”的审美取向与花灯这一传统文化载体深度融合,提高了“三月三”传统节日花灯的视觉效应和文化价值,同时传承和发扬了广西在地的铜鼓文化,是广西铜鼓文化图形在文创中的成功实践。

4 结语

在当代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大多数民俗造物并非居于繁盛的处境,而是渐趋泯灭,甚至呈文物性存在的状态。伴随着传统民俗的式微,民俗造物的本初功能逐渐被遗忘、摒弃,使用空间被挤压,独立生存能力弱化,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日渐消泯^[15]。铜鼓作为广西民俗造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艺术价值,是广西最富有代表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它彰显我国西南地区多民族社会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铜鼓历经数千年传承,在当代面临着实用功能减弱、独立生存能力弱化的处境,引入“归纳—提取—分解—重构”的现代设计手法,实现铜鼓三维空间造型与装饰图案在新载体上的模块化应用,是在当代传统文化复兴潮流中发扬铜鼓文化的可行方案之一。铜鼓造物艺术在“三月三”传统节日花灯中的模块化应用,为其他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普及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陆秋燕.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铜鼓概览[J]. 文物天地, 2018(11): 25-29.
LU Qiu-yan. An Overview of the Copper Drums in the Guangxi National Museum[J]. Cultural Relics World, 2018(11): 25-29.
- [2] 秦红增, 万辅彬. 壮族铜鼓文化的复兴及其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启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25(6): 42-45.
QIN Hong-zeng, WAN Fu-bin. Revival of Kettle-Drum Culture of Zhang Nationali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Protecting National and Folk Culture[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5, 25(6): 42-45.
- [3] 姚远. 民间竹器物对产品绿色设计的启示[J]. 美苑, 2011(3): 103-104.
YAO Yuan. The Enlightenment of Folk Bamboo Objects to the Green Design of Products[J]. Art Work, 2011(3): 103-104.
- [4] 唐甜. 广西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22): 118-120.
TANG Tia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Art Elements from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in Cultural Innovative Products[J].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Innovation, 2020, 4(22): 118-120.

- [5] 谢崇安. 上古滇系铜鼓对骆越铜鼓造型与纹饰的影响[J]. 民族艺术, 2016(6): 62-68.
XIE Chong-an. The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Copper Drum on the Shape and Decoration of Luo Yue's Copper Drums[J]. National Arts, 2016(6): 62-68.
- [6] 张洛源, 宋魁彦. 广西铜鼓形制规律探讨[J]. 大众文艺, 2019(2): 159.
ZHANG Luo-yuan, SONG Kui-yan. The Law of Copper Drum-Shaped System in Guangxi[J].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2019(2): 159.
- [7] 丁静. 铜鼓装饰图案纹样在现代插图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艺术品鉴, 2020(14): 153-154.
DING J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pper Drum Decorative Pattern Pattern in Modern Illustration Design[J]. Appreciation, 2020(14): 153-154.
- [8] 覃溥. 广西铜鼓精华(上、下)[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QIN Pu. Guangxi Bronze Drum Essence (Upper and Lower)[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9] 李向振. 文化资源化: 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理念转换及其价值实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10): 31-38.
LI Xiang-zhen. Cultural Resources: Conversion of Minor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oncept and Its Value Real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20, 41(10): 31-38.
- [10] 贾朝红. 铜鼓的美学研究及在工业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11, 32(20): 53-56.
JIA Chao-hong. Aesthetic Study of Bronze Dru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dustrial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1, 32(20): 53-56.
- [11] 黄润柏. 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研究——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研究之一[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6): 122-130.
HUANG Run-bai. A Study to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Zhuang's Festivals: Part I of Study to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Zhuang's Festival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8(6): 122-130.
- [12] 黄龙光. 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J]. 思想战线, 2017, 43(1): 150-155.
HUANG Long-guang. Three Inheritance Paths of Current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Thinking, 2017, 43(1): 150-155.
- [13] 李雨甜. 同构图形在包装创意设计中的应用探析[J]. 包装工程, 2020, 41(8): 275-279.
LI Yu-tian.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somorphic Graphics in Packaging Creative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8): 275-279.
- [14] 余家仪, 张志贤. 探析灯笼文化在产品中的传承与发展[J]. 包装工程, 2017, 38(12): 159-163.
YU Jia-yi, ZHANG Zhi-xian. Initial Analysis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ntern Culture in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12): 159-163.
- [15] 韩波. 中国民俗造物的艺术本体价值诸向度[J]. 艺术百家, 2014, 30(4): 190-197.
HAN Bo. Multi- Dimensional Noumenon Value of Folk Design[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4, 30(4): 190-197.